

衢州中南门之战

刘国庆

宋汉武遗照。



东南孔道衢州地处闽浙赣皖四省之边际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“守两浙而不守衢州,是以浙与敌也;争两浙而不争衢州,是以命与敌也”。因此,衢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在冷兵器时代,衢州古城固若金汤,进可攻,退可守。清初耿精忠的“三藩之乱”,咸丰间太平军石达开、李秀成、李世贤的先后攻城,光绪间刘家福的“红巾军”起义,皆兵临衢州城下,却久攻不克,故赢得了“铁衢州”的美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由于衢州机场的大规模扩建,衢州的军事战略地位再次凸显,并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的一座焦点城市。

1942年4月18日,美空军杜立特突袭日本东京本土的军事行动后,原计划16架B-25重型轰炸机将降落在衢州机场,后因油耗耗尽而迫降他处,飞行员大部分被中国军民所救助。

“杜立特行动”使日本军方蒙羞。衢州机场对日本本土所构成的严重威胁,引发其巨大的恐慌。于是,日本大本营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田俊六元帅,纠集了第13军团、第11军团等近15万的兵力,兵分三路,自浙江、江西南北夹击,发动了以破坏衢州机场为主要军事目标的“浙赣战役”,并在5月底对衢州形成了合围的态势。

一场“衢州保卫战”即将打响!中国军队也调集了5个军的精锐部队,当时的一批著名的抗日战将如王耀武、王铁汉、丁治盘、张灵甫、余程万、李天霞、陈颐鼎、曹天戈等所部皆布防于衢州四围,准备决战。86军第16师、67师负责城防,军部设城西钱家山。

但是,正当中日双方已经开始短兵相接之际,6月1日凌晨,重庆最高统帅部却改变了作战部署,并下达了终止衢州会战的命令。

6月3日拂晓,大雨滂沱。日军第32师团、第116师团在衢州以北,河野毅混成旅团、第15师团、第22师团开始在衢州以南,冒雨对衢州发起全线攻击。日军出动了大批飞机,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不间断轰炸。

6月4日,第三战区长官部将最高统帅部停止衢州会战的命令传达至各军、师部。衢州守军仅留86军第16师、67师坚守,大部守军开始奉命与日军逐渐脱离接触,交替掩护,相继撤出了衢州战区。

6月4日、5日,日军冒雨连续发起猛烈攻势。衢州古城陷入一片炮火硝烟中,这是一场兵力火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斗,胜负悬念不大。由于日军兵力强大,攻势迅猛,衢州以北守军16师的阵地,尽被日军第32师团攻占,中国守军大部溃退或伤亡。

日军第32师团一部进驻距衢州城北门仅2公里的衢江北岸龚家埠一带,其主力继续进攻石梁附近。86军付出惨重的代价,伤亡官兵2200多人。而在此关键时刻,86军军长莫与硕又擅自脱离了战场(战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)。

此时的衢州已经成为一座孤城,军队人心惶惶,

气氛紧张。城中的炮兵部队、机动车辆竞相开始撤离,仅留下掩护主力撤退的第16师46团谢士炎的两个营在死守。

二

6月6日,日军第13军团司令泽田茂下令采取焦土战术,对衢州城施以最猛烈的攻击。下午两点,总攻开始。

衢州中南门的鏖战最为惨烈。

民国时,衢州全城城墙围绕,砖砌的城墙高达5米。在衢州保卫战,城墙周围已布满了铁丝网,城上就是城堡阵地。

当时的衢州南门有大南门(即礼贤门)、中南门(即南湖桥之新城门)和小南门(即通仙门)。而所谓的“中南门”,当时并没有正规的楼门,而是随着浙赣铁路的建成和火车站的设立,在仁德坊原封闭的城墙段,打开的一个豁口,以便通往车站,也叫“新开门”。

当时,担负中南门的守军是46团二营营长宋汉武部。宋汉武(1911-1942),字子寅,湖南邵阳人,黄埔军校毕业。

此时的中南门,已用沙土袋累砌,建成了坚固的地碉堡。城墙上设置了枪炮眼口,城墙两侧是捷克重机枪的枪座和地十字炮火,当时,军中还有罕见的比利时制造的勃朗宁重型机枪。桥跟前、桥梁和城墙之间用铁丝网层层围住,通往城中的桥梁仅留下桥墩和剥落的踏板。

宋汉武临危受命,为衢州城防指挥官,号召全体官兵:“人在城在,誓与阵地共存亡。”将士们坚守阵地,斗志昂扬。日军在飞机、大炮掩护下,数次向中南门守军阵地猛扑。宋汉武沉着应战,命令全营官兵斗志昂扬,坚守阵地,在积水没膝的战壕里,奋勇抗击日军,多次击退来犯之敌,致使日军受挫于衢州城下。

三

担负进攻中南门的是日军第15师团第60联队,联队长仓桥尚大佐。其师团长酒井直次郎中将不久在进攻衢州途中,在兰溪触雷毙命。

日军飞机轮番轰炸,炮兵集中射击。暴雨的阴霾使衢州的天空更加暗淡。日军在火车站附近以迫击炮、重型、轻型机关枪、掷弹筒、步枪等发起进攻,城门附近卷起滚滚硝烟和沙尘。

衢州抗战记忆



1942年的衢州中南门。

日军60联队川越大队长随即展开贴近前头阵地的冲锋。工兵和突击队,一波接一波的紧随其后。中国守军的交叉火力,手榴弹如雨点般飞去。第一波日军七连第一突击队全军覆没,队长鱼鸭野田少尉也毙命于城下;第二波日军五连第二突击队队长浅野少尉到达城墙下,被铁丝网拦住。宋汉武部从碉堡射出的机关枪和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打爆他的头,滚进了护城河中。从桥到城门,日军突击队员的身影一波又一波地消失在弥漫的硝烟里,倒在血泊中。日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在衢州中南门主阵地不到1000米的战场上,日军遗尸累累,血流成河。在城墙下,日寇和中国守军的尸体也叠加在一起,乱成一团,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。

日军总攻开始后,又集中优势兵力向城防阵地倾泻炮弹,并丧心病狂投掷毒气弹。宋汉武身先士卒,亲临指挥,激励战士,前仆后继,血战至下午2时许,不幸中弹倒地,临终前犹叮嘱部下:“继续战斗,誓死保卫衢州。”之后,副营长彭如、副官邹勇等相继壮烈殉国,全营官兵除阵亡、重伤被虏者,无一投降。

6月7日8点45分,日军60联队第二大队率先攻入中南门。11时,接替酒井师团长的石川兵团长入城。衢州城头挂起了日本“膏药旗”,千年古城衢州即此沦陷。中南门的城墙上、碉堡里,皆躺着阵亡中国官兵的遗体,甚至还有抱着机枪死去的军人。

2018年清明时节,长眠于衢州76年的抗日英烈宋汉武终于等来了孙女宋晓凤等一行接他回家。

漱水呜咽,鹿鸣悲歌。青山埋忠骨,山河念英魂。衢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!

“双抢”印象

胡志刚

当骄阳炙烤着大地,蝉鸣在枝头呐喊,农村的“双抢”大幕便徐徐拉开了。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,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,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。

清晨,曙光还未来得及完全驱散夜的黑暗,村庄便在鸡鸣犬吠中渐渐苏醒。老爸老妈早已蹑手蹑脚地起床,简单洗漱后,老爸便扛着农具,匆匆走向田间,老妈则在灶台前忙碌着,铁锅里煮着浓稠的稀饭。我们兄妹四人也正好放暑假,在睡眼惺忪中被母亲唤醒,扒拉几口早饭,就跟着大人的脚步,踏上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。

割稻,是“双抢”的第一道工序。老爸总是站在最前面,镰刀挥动,稻秆应声而倒,再扎成一捆捆,码在田间。老爸的动作一气呵成,我们兄妹四人则跟身后,小心翼翼地割着稻子。镰刀在我们手中显得格外沉重,不一会儿,我们的手掌上便磨出了血泡,疼痛钻心。

太阳渐渐升高,炽热的阳光如无数根钢针,刺在我们的身上。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衫,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。我们顾不上擦拭,只是埋头苦干,想尽快把稻子割完,为晚稻的播种争取时间。

割完稻子,接下来便是打稻。打谷桶早已摆在田中央,两人一组,把稻把高高扬起,狠狠摔在桶壁上,谷粒便如雨点般落下。中午不回家,饭由家里人

送来,竹篮里装着凉透的饭团和咸菜,蹲在树荫下匆匆吃完,又投入下午的劳作。

晒谷场,是“双抢”期间的另一个战场。刚打下来的稻谷还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日光的余温,就被我们均匀地铺在晒谷场上,接受阳光的洗礼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们就用耙子将稻谷翻动一遍,确保每一粒稻谷都能晒得干透。在这个过程中,还要时刻留意天气的变化,一旦发现乌云飘来,就要迅速将稻谷收拢起来,盖上塑料布,以防被雨水淋湿。

二

至此收割的任务算是暂时告一段落。可“双抢”的战鼓才刚刚敲响,接下来的拔秧和插秧才是真正的挑战。

老爸带着我们来到另一块专门育秧的水田。这里的水清澈见底,嫩绿的秧苗在水中轻轻摇曳。他率先踩进水田,弯下腰,双手熟练地抓住秧苗的根部,轻轻一拔,一簇秧苗便被连根拔起。我学着老爸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伸出手,可刚一碰到秧苗,它就调皮地滑走了。试了几次,才渐渐掌握要领。我们把拔好的秧苗整齐地捆成一小把一小把,挑到要插秧的田边,为接下来的插秧做准备。

插秧可是个技术活。老爸走在最前面,他就像

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,在水田里划出一条条笔直的线。然后,将秧苗准确地插入泥中,每株秧苗的行间距都恰到好处。而我,插起秧来总是歪歪扭扭,不是插得太深就是太浅。老爸耐心地给我示范,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掌握力度和角度,渐渐地,我找到了感觉,速度也越来越快。

在割稻、拔秧和插秧的过程中,水田里那可恶的蚂蟥常常会悄无声息地爬上小腿,一扯,血珠渗出,也只好随手抹一把泥巴压住。“双抢”的任务实在太重,仅靠我们一家人的力量远远不够。于是,附近的亲朋好友、隔壁邻居纷纷赶来帮忙,他们中有经验丰富的老农,也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大家一到田边,便卷起裤腿立刻下田,老农们手法娴熟,他们一边插秧一边聊天,分享着种植的经验和趣事;小伙子们则干劲十足,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马驹,在水田里来回穿梭,不一会儿就插好了一大片。有了他们的加入,水田里顿时热闹起来,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野的上空。

傍晚,当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一片绚烂的橙红色,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。

双抢的日子,累得人直不起腰,却也最踏实。但它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价值。每一个参与“双抢”的人们,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,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。